

劉燕明的悲與喜

劉燕明是“藍鵲飛過”“台灣獼猴”的攝影與導演。
劉燕明的經歷反照台灣社會的冷暖。
他嚐盡社會冰雪現實，
也經歷了人性暖陽的一面。
劉燕明一向是個獨行者，
可是如今由於他的堅持，
正喚醒更多深藏在台灣人內心的熱情真性。

在無力中出力

住台北木柵政大附近的人，經常可以看見一位滿臉絡腮鬍子的矮個兒男人，左右手提沈甸甸的大袋，胳膊上還弓著一長筒鋁架，排長龍，等指南客運，他的外表十足讓人想像，是個藝術家吧，除此之外，甚難再有其他念頭。

這人名字叫劉燕明，一溜口兒叫他名字，還以為是說“留——燕——明”這名字分明是燕鳥拍照的意思，果真他是。劉燕明在關渡四寒暑，為台灣留下第一部候鳥紀錄片。

“關渡水鳥歲時紀”是劉燕明累積4年3萬多呎膠卷，剪出來的30分鐘紀錄片。這部片子是劉燕明摸索拍電影14年，日思眠想自己到底想做什麼，碰碰撞撞，試這試那，終於“找到了”，並意志堅定工作至今的首部面世作品。

劉燕明被攝影機的魅力所吸引。他說：“我心裡想要的是一種——連動的感覺。不是只是瞬間的停息畫面，而是一種傳真世事，情與景連續移動的豐富實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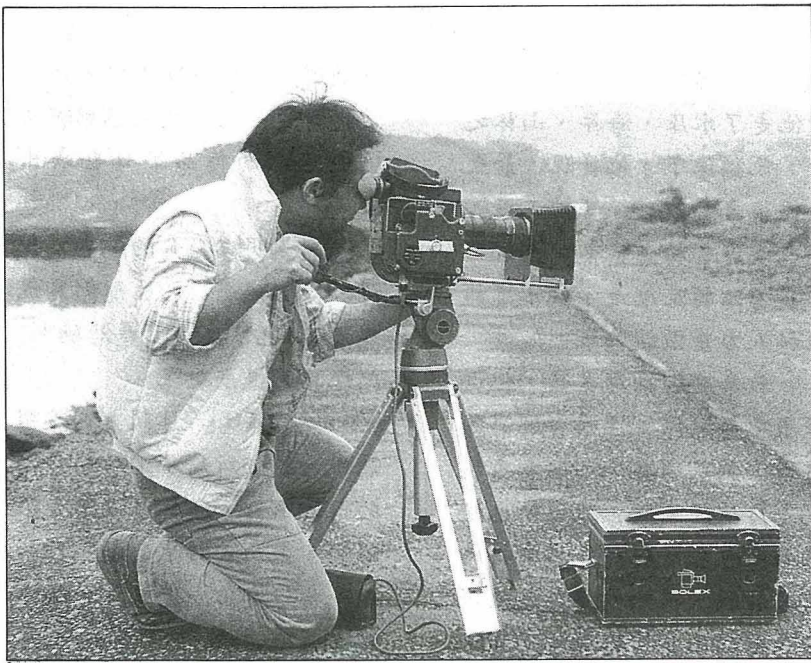
寫鳥、寫詩出名的劉克襄曾經陪劉燕明赴關渡工作。他說：“跟一次就知道有多苦。”拍鳥講究的是水磨功夫。鳥是挺怕人的動物，長著翅膀，易受驚，逃得比什麼都快。因此拍鳥的第一課，要能“隱形”。躲個三、五個小時是常有的事，必要時要躲一整夜。淡海溼地，擱淺的破船上，先餵蚊子再說。如果沒得躲，那就穿著長筒雨鞋在水裡站，讓鳥覺得你不是人，覺得你無害、不重要，或甚至是風景的一部分。

跟他去拍鳥，絕不像郊遊，不可以吃、不可以說，啞

一天。劉燕明說：“許多人興沖沖跟我去，沒有人挺得住。”苦差事，傻子才做。

劉燕明常很自豪他“蹲”的功夫。可是拍完“關渡水鳥歲時紀”在錄音間的最後一夜，他忍不住喃唸說著：“唉，這隻片子還不知道應該怎麼回收。”又累、又苦、又損、又沒收入的工作，他幹嘛做？

回憶他14年的打滾歲月，劉燕明用一種很感慨的口氣說：“我曾想用長鏡頭拍各種人，在台北走來走去的……”這就是他一直想完成的“偉大”作品——“台北的一天”。他說：“居住在城裡是件大不易的事。想一想，為了讓你活得好好的，有多少人默默在為你忙。”說著他虛擬比劃16厘米鏡頭往前延伸的動作。清晨收垃圾工人、掃街的、果菜



在關渡拍鳥，蹲了4年的劉燕明。

市場的，那一群起大早的社會底層人物，在他的想像中活起來、動起來。他曾很認真去拍這些他認為能夠反映台灣現實的影像，為這個時代錄寫人與事。可是，台北城卻不領他的情。

劉燕明曾搬攝影機拍百貨公司為櫥窗模特兒換衣服的鏡頭，被當成“色情狂”打出來。這些都是10年前的事。劉燕明說著又無奈、又傷心，像昨天、前天的事。此後，他改變“戲路”，拍教材、民俗。想藉當時正大力推行的“視聽教育”風氣，為中、小學生拍攝一些可以參考的文化題材。

他的“教材夢”很快就破碎了。他說：“在升學主義下，此地的美術教育根本是空架子。”學校的行政人員說沒經費買這些作品。看懂他作品的人大表讚許之意後，從無下文。中、小學空有放映室、放映機，買了一些有“關係”的

人介紹的外國影片，擺著當成教學評鑑時爭取分數的“飾物”。

“作品好沒有用，關係好，才有用。”為了讓他的心血不白費，他請託了“關係”，總算在桃園、台北幾所國中推銷了一些。後來透過畫家梁丹丰的推薦，新聞局願意採購做海外文化宣傳之用。劉燕明說：“他們在片頭加上……台灣生活富裕……有能力有這樣的文化……中國歷史有好的文化……老早就有這樣的生活素質。”他苦笑地說：“我如此折騰，共賣了40個拷貝，總算平衡了老本。”

以後劉燕明不敢做教材了。他想起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的動物生態影片。台灣鳥類生活史的構想終於在他最感困頓的日子中，栽入劉燕明的大腦。

如果有人問劉燕明，為什麼要拍鳥？劉燕明會以一種近

乎卓別林的口氣與手勢說：“鳥不會問我，你是那個單位的？你為誰工作？你的目的何在？”

在長期的挫折中前行，劉燕明養成一種在退縮中求自尊的喜劇性格。他和氣、好交朋友，說起話來可以整晚不休息。他的故事太多了，三天三夜也說不完。初見面，我們隨意談，他喜歡說一些從工作經驗磨出來的“學術問題”。關渡水鳥一出現，他馬上喊出名字。他說：“就是鳥類專家，也未必看得這麼仔細。”他在關渡蹲了4年，的確有大聲說話的權利。

他是那種做事很投入、很深、很穩的人。幾年來，在環境公害地走踏的經驗，常有一種深深的感動——尤其遇到那些願意守著土地、守著家鄉的人物時，他們眼看著由興而衰的景致，因太感傷而顯得忘情，用遠遠、清清的口氣述說著山水病歷。劉燕明有著與他們相同的氣質。我一直覺得，像他們一樣，盡一生去陪伴山水的人，最有發言權。

最可貴的是，他們並不是滿懷信心從事，在他們的觀念裡也沒有什麼童話式“光明的尾巴”，所謂快樂結局的期待。他們只是做，像命中註定、設定了一般。他們並不比一般人有較粗的神經、較大的膽量或才氣，他們只是苦幹、務實，並真心喜愛這塊土地。

劉燕明的拍片幻想中，曾有一段日子，他十分憂慮公害入侵台灣的問題，也立志要拍

鄉間小路

月刊

豐年社發行
中華民國64年創刊

Country Road
monthly
SINCE 1975
Published by HARVEST
Farm Magazine
14, Wenchow St.
Taipei Taiwan, R.O.C.

發行人 余玉賢
社長 沈葆彭
副社長 高明堂
總編輯 李赫
副總編輯 余淑蓮
兼主編
編輯 黃玉兒
徐以瑜
業務經理 簡芙蓉
業務副理 張慶貞
廣告組長 林嵩展

設計／不老林創意房
印刷／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29號
(02)9150123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
版台誌字7763號
中華郵政台北字3302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社址／台北市溫州街14號
電話／(02)362-8148 363-4055
傳真／(02)363-6724

定價／每本零售100元
全年訂費1000元二年1800元
郵政劃撥／0005930-0豐年社

國外訂費 (一年)	U S S		
	水平 陸郵	香港、門	亞洲、太平洋 歐、美、非洲
	64	84	84
航平 空郵	香港、澳門	亞洲、太平洋	歐、美、非洲
	89	99	109

引用本刊圖文資料
請註明出處來源
並請代為推介

名叫“無形殺手”紀錄片，但當他走了水庫、海岸、山林之後，他猶豫了。他發現，最大的污染者是政府經營的工廠，是有錢有勢的企業家，他說：“我當時的反應是，我不可能以私人力量做這些事。”

放棄公害攝影之後，他選擇了生態紀錄。在攝影鬧窮的時候，劉燕明從來不願意去找人支持他的工作，雖然他也覺得那樣會更有保障。拍教材的艱苦經驗，讓他覺得自己被現實社會結結實實的教訓一頓。

他打工賺錢，為商店拍些商業片子，以片養片，賺多少錢，拍多少片。

最近，他接了一項相當學術性的工作，上溪頭拍台灣特有種鳥類的生活史。藪鳥在他的耐心等候下，入了膠卷，又是國內首部特有種鳥的生活紀錄。

突破塵封而出

1987年是劉燕明田野工作的重要轉變年。他開始結交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上山為野生動物攝影時不再孤單，也逐漸理出他的工作路向。由於他的堅持，他不對現實社會妥協，也不計代價的對台灣特有種生物投入生活紀錄攝影的心力，開始有人願意與他站在一起，如何在缺乏資源的情況下，完成影片，為台灣山林活物留下見證。

當時還在六龜分所任分所長的老金——金恆鏞是最具俠義精神的政府公務員，他逐漸

認識劉燕明的特殊工作之後，常掛口說是：“我們應想辦法讓劉燕明的作品早日發表出來。”

劉燕明與老金的相會，使得“藍鵲飛過”的生態影片成為可能，也催生了“台灣獼猴”紀錄片的提早誕生。

1987年6、7月間，劉燕明聽說六龜分所扇平工作站作鳥的情況很好，而且主人老金很好客，上山為野生動物工作的人，不論身份一概吃住、接送招待。畫鳥的何華仁通風報信：發現一窩藍鵲，更讓劉燕明下定決心把扇平列入長期重點工作地。

當時老金是剛從國外回台灣服務的學者，他一回台灣就自願到山上工作，如果有客從台北來扇平，他一定徹夜開“喝茶會”聊天，題材天南地北，隨客人高興，力行言論自由，從政治、經濟、文化到野生動物的未來，許多事情，也就透過老金的扇平聊天會，漸漸成形，付諸實現。

1988年5月，老金通知劉燕明剪出一支野生動物田野調查的毛片20分鐘帶上扇平，說是有“重要人物要上山”。老金所說的重要人物是：台大動物系林曜松教授、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劉小如教授等人，這次應老金之邀上山“度假”，幾乎是台灣關心山林、野生動物的學界人士全到齊的會！

當夜，劉燕明在扇平日式小屋，放映他多年所拍攝的野生鳥類片段，其中有7、8種是

(下轉第8頁)

台灣特有種，還有藪鳥在巢內繁殖的片斷，幾名學界人士第一次見識到16厘米彩色紀錄的魅力，細緻的色彩以及精彩的影像讓林曜松及劉小如留下深刻記憶。

老金放完影片趁大家還回味無窮時說：“各位，電影不是白看的。”這句話為台灣促成了兩支16厘米生態紀錄片。

隔天清晨，林曜松在扇平賞鳥步道上問劉燕明：“願不

1990年6月台灣獼猴的片子殺青，片子的完成實際過程十分坎坷。為保持紀錄片的內容忠實，為了學術的需要，又得考慮片子能為大眾、兒童接納，還得想到新聞局審片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故事如何說下去，台灣本土背景如何襯托，都使導演劉燕明感到棘手。這些工作最後仍一如往歷，由一些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朋友捲起袖子投入人力。

這一切都要歸功於劉燕明的堅持，他默默的為台灣這片大地工作，是最好的說服，他的影片佐證著他所為不虛。在這段不算短的日子，他的好朋友經常要他扛著機器到處放映毛片，並充當影片解說，讓更多人瞭解，並期望從中獲得支援，99%的人都對劉燕明表示欽佩，但無能為力。這些情境曾經沈重打擊過劉燕明，讓他一次又一次體會到“自己是在做傻事”的感受。這些都沒讓他倒下去。他仍咬緊牙根，撐下去。

有一回，他在元穠茶藝館應朋友之邀，為一些企業界的年輕一代放毛片，大夥兒討論怎樣才能讓台灣野生動物的影片問世？許多人談到如何幫劉燕明完成這個工作。……事後劉燕明極度無奈的表示：“怎麼會變成『幫我』呢？保護台灣野生動物，為台灣生態留記錄，是台灣人的共同責任，怎麼會是『幫我』呢？”

不管劉燕明如何無奈，有“幫他”的想法的人，已屬難能可貴，他漸覺沒什麼好苛求抱怨的。從1987年之前，他到處碰壁，到1990年以來，愈來愈多人看見他的獼猴及藍鵲紀錄片，想來“幫”；劉燕明漸能體會，只要他繼續上山下海，照他所堅持的生活方式工作下去，深藏在台灣人內心對土地的热情，與對本土的真性，就會突破塵封而出。他不會孤獨，路走得愈長，他發現朋友愈多，從四處八方湧現……



劉燕明的影片讓台灣獼猴第一次在世界學術舞台上亮相。

願意合作拍攝台灣獼猴？”這項研究由林曜松指導的研究生吳海音進行調查，當時已進行了兩年多，還沒有留下影像紀錄。劉燕明的影片讓台大動物系興起一個從來不敢有的念頭：把台灣獼猴生態紀錄片送到將在日本舉行的第13回世界靈長類會議。1990年7月台灣獼猴第一次在世界學術舞台上亮相，他們做到了。

獼猴片子的編劇是由中時晚報的撰述委員蔣家語擔綱，她提出加入卑南族猴祭的山地風俗為前引，拉出整個台灣獼猴故事，獲得“職業的業餘工作群”同意。後來的藍鵲紀錄片，也由同一工作群討論刪修劇本。片名則由金恆鑣脫口而出“藍鵲飛過”——這片名既富浪漫氣氛又兼有紀錄片之理性忠實，獲全票通過。